

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

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一八五二—一九一一年）

■ 颜清漳 著

■ 粟明鲜、贺跃夫 译

■ 姚楠 校订



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

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一八五——一九二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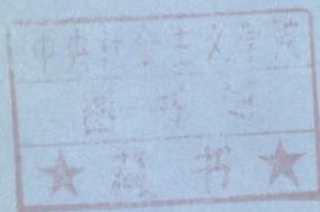
颜清湟 著

栗明鲜、贺跃夫 译

姚楠 校订



200211617



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

〔澳大利亚〕 颜清湟 著
粟明鲜 贺跃夫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frac{1}{32}$ 15 $\frac{1}{8}$ 3528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314-5/K · 38

定价：8.30元

序

关于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一直存在着许多尚未澄清的问题。许多学者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清政府对华南各省要求扩大海外贸易的反应颇为迟钝。然而，人们较少注意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在19世纪中期，清政府为什么对华南人口的大量外移麻木不仁？这些移动是极其戏剧性的。而一些海外华人社区，由侨居的商贾、工匠以及他们在当地的家属所组成的社区转变为适应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而来的契约劳工所支配的社区，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变化，结果也同样具有戏剧性。颜博士在对清朝的海外华人政策的研究中，探讨了这一问题的历史和外交背景。他并不是简单地作出回答，而是对当时所出现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对清朝最后几十年中有关的中国政策，作了精湛的论述。中国近代史学家们出于对海外华人的同情，往往描绘出官方对海外华人冷漠无情的情景，而他却对这种情况提出不同看法。

颜博士尤能胜任解决这个具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一位硕学之士，他已在对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各邦华侨支持辛亥革命一书的全面的、权威性的研究中，享有声誉。该书已同时由一位台湾的历史学家和大陆的几位历史学家译成中文，前者的译文已在台湾出版。颜博士对东南亚华人的了解，在他二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在这部有关清朝政策的新著

中，他又把他的研究工作扩大到对有关南非和美国华人的外交事务。从而他首次用一种西方语言，对于官方在东南亚及华人其他居住区的华人事务做了比较研究。我们认为颜博士的博大精深研究给人以启发。它不仅告诉我们，中国政府和西方各国政府当时想做些什么，而且还向我们启示了华人在决定东渡太平洋或南下中国海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王康武

1983年7月，寄自福建厦门

中文版序

本书能和中文读者见面，感到非常高兴。在出版之前夕，想讲几句话。

一九七一年初，当作者在南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历史系任教时，开始构思写一部有关清朝对华侨政策的书，原因是作者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及后来修改博士论文出版成书时，常觉得这样的一部书可以填补中国近代外交史和华侨史上的一大空白。

这样的一部书，上观中国历代海禁的演变，下察晚清外交与华侨政策的更迭，对外交史与华侨史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可是这样的一项艰巨工作，在中国和外国学者中尚未有人作出尝试。我秉着向学术疆场进军的无畏精神，毅然把这项工作逐步付诸实现，其中经历不少困难和挫折。

这项工作最大的困难是资料搜集问题。由于内容广泛，牵涉的事项繁多，而资料散佚在世界各地。如果作第一手的研究，势必要亲身到世界有关各国的图书馆和档案局进行搜罗。同时，这样的一个课题并无现成的而有系统的史料可作基本的依据。许多有关华侨的史料都是零星碎片，参杂在各档案、官书、私人笔记、期刊和报章中，作者的第一步骤就是把澳大利亚各大图书馆所收藏的有关清朝档案、官书和报章的史料查出复印并制成卡片。自一九七一年起至一九七三年止费时三年之

久。第二步就是到台湾各重要档案馆搜集有关资料。一九七四年作者乘进修假期之便，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所获颇丰。基于这些史料，一九七五年开始动笔，一九七八年初稿完成。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到海外华侨社会实地考察和搜集档案资料，以补充澳大利亚和台湾两地史料的不足。一九七九年二月至八月，作者以半年的时间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把文字资料所形成的印象实地印证一下。新、马的华侨社会是笔者所熟悉的，但对于英、美、加等地的华侨社会所知甚少。此行不仅获得不少的珍贵史料，而且加深对当地华侨社会和历史的认识。

这些从世界各地所搜集的丰富史料构成本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给作者很大的方便以鉴定和修正前人的错误，譬如笔者根据清季外交史料，总理衙门档案，清朝商务官报和钱恂的笔记“二二五五疏”来修正美国学者李威廉教授(Professor Lea E. Williams)在他的《华侨民族主义》一书，(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nesis of The Pan—Chinese Movemont in Indonesia 1900—1916)中所犯的一些史实的错误(见本书第四章注释249和250)。

在出版方面，本书也遭受了一些挫折，一九八一年底本书完稿后，曾与一些出版商接洽。最先接洽的是亚洲区的牛津大学出版社，该社总部设在吉隆坡，年来曾出版不少有价值的有关亚洲问题的历史书籍，当时该社负责人表示对本书有兴趣，原稿经审查学者细读之后推荐该社接受出版，但该推荐却被该社的市场经理所否认。原因是他认为本书不能畅销，出版社会赔本，除此之外，本书的内容不仅侧重东南亚的华侨，同时也涉及北美、中美、南美和南非洲等地的华侨，在内容方面已超

越亚洲的范围。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主编在给作者回信中提到拒绝本书出版的理由，但也强调本书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所以推荐本书交由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他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主编信中表示本书如在美国出版，他愿意承担在亚洲区销售400册。后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因本书并非完全涉及北美华侨，所以婉拒，经过这挫折之后，接着和英美的一些出版社接洽，大都以本书的课题没有大量的固定读者为辞而拒绝。其中英国的一家出版社科拉咸出版公司(Groom Helm)原是愿意接受出版，但认为本书的读者不多，一定亏本，所以索取澳币两千元作为补助经费。当时作者认为本书如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相信可以得到一些出版社的青睞，不须支付补助费，所以回信婉拒。一九八二年秋，新加坡大学出版社经审查学者的推荐接受本书出版。原稿经部份修改后于一九八五年正式问世。本书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颇受好评，一九八七年五月间，瑞典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基兰德先生(Svante Kilander)曾以瑞典文给本书写了书评，并在瑞典报章上大力推荐。

本书的译者粟明鲜和贺跃夫两君是年青有为的学者，中英文基础深厚，对中国近代史和华侨史的造诣也很深。一九八三年十月间当作者访问广州中山大学的时候，结识了粟明鲜君，粟君彬彬有礼，对华侨史和东南亚史深具兴趣。他曾把拙作“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间新马地区的孔教复兴运动”(The Confucian Revivemo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e, 1899—1911)一文译成中文刊登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粟君的译文流畅而可靠性高，作者觉得非常满意。后来粟君和贺君来信表示愿意翻译本书为中文，作者欣然接受。本书中文译本蒙华侨史前辈姚楠(梓良)教授校对，增光不少，早在五十年

代末期当作者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就读时，已经听过姚教授大名，一直到一九八七年九月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华侨史会议上才有机会和姚教授相识，去年四月秋又在厦门鼓浪屿召开的国际华侨史盛会中和他聚首一堂共同研讨华侨史问题，深感荣幸，此次本译本蒙他校对出版，作者仅向他深致谢忱。最后，作者对粟明鲜和贺跃夫二君在译稿上的努力，在此向他们致谢。

颜清煌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四日于香港大学历史系

前 言

本书的研究工作始于1971年。当时还有两位学者对与此有关的一些课题感到兴趣：他们是罗伯特·艾文博和王省吾，前者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后者是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物部主任。艾文博的兴趣在于清朝对苦力贸易的政策，而王省吾则致力于研究19世纪的华人移民，尤其感兴趣的是华人移居澳大利亚。后来王氏与艾氏的著作均已出版。我的研究无论是在视野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比艾氏和王氏的研究更为广泛。我所要探讨的是，清朝对海外华人政策的实质是什么？政策是如何执行的？它又为什么失败？本书虽论及所有海外华人，但主要集中于论述东南亚和美国的华人社会。

我从澳大利亚各图书馆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图书馆收集了各种已经发表的资料。我尤其受惠于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物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方图书馆，以及悉尼的悉尼大学东方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在上述各图书馆收集的资料，为本研究项目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1974年，我获得了在东南亚、香港和台湾为期一年的研究假期，得以查阅保存在台湾的清朝档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总理衙门和外务部的档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

找到了晚清教育部和商部的公报，即《学部官报》和《商务官报》。这两种公报对本项目非常有用。

本书的初稿完成于1978年。但我对它并不满意，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详尽地占有这一课题的原始材料，也未能访问那些我所执笔撰写的美国和加拿大华人社会。1979年，我获得了研究假半年，使我得以访问英国和北美。在伦敦，我在拉塞尔广场的大英图书馆东方手稿文件部、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图书馆、伦敦大学总图书馆以及位于丘园的公共档案局查阅资料。在北美，我访问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和休顿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纽约历史学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档案局，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多伦多的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图书馆和檀香山的夏威夷大学图书馆。

在这些图书馆里，我有机会查阅了一些与本课题有关的英美档案中的原始记录。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我翻阅了一些有关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社会活动的旧华文报刊。在公共档案局，我详细地查阅了与本课题有关的外交部和殖民部档案，尤其是1877年至1912年间中国驻伦敦公使与英国外交大臣之间的往返公文。在美国，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查到了从1877年至1891年间移民局的原始记录，以及在1879年至1906年间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与美国国务卿之间的往返公文。移民局的那些记录材料，即所谓另外保存的华人档案，由美国移民局处理华人移民事务的官员所写报告和信件组成；它们被保存在六个没有分类的大箱子里，迄今尚未被制成微缩胶卷。

我还有机会查阅1856年至1912年间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旧华

文报刊。其中，保存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的《中西日报》和保存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的《新中国报》最为有用。此外，我还有机会翻阅保存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的域多利(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原始档案。域多利中华会馆在本课题所研究的这段时期，是加拿大华人社会中的主要组织，它的档案材料应该受到学者们的特别重视。

我还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各华人社区的所在地，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与一些当地华人就有关海外华人历史的撰写进行了交谈。这些所见所闻，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使我对论述华人社会更具信心，而且也使我洞悉了百年前这些华人社会的问题。

我在1979年旅行访问期间所收集到的新材料，对本书初稿的修改帮助极大。

在撰写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在此，谨对下列机构的图书馆人员表示感谢：阿德雷德大学巴尔·史密斯图书馆、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方图书馆及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物部、悉尼大学东方图书馆、墨尔本大学东方图书馆、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以及前面已提到的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各个图书馆。

我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的指导并为本书作序。我也感谢我的同事罗伯特·达里博士和斯蒂芬·拉吉博士以及我的朋友、莫纳斯大学的迈克尔·戈德莱博士为润色原稿所作的努力。此外，我也对本校历史系的贝弗莉·阿诺德女士与亚洲研究中心的詹妮弗·杰弗里斯女士为本书原稿打字表示

感谢。

最后，我谨对我的妻子桂英的谅解和鼓励表示感谢。

颜清煌

阿德雷德大学历史系

导 言

在清史研究中，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世界的学者，都不大重视清朝对其海外臣民的政策。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忽视，主要是由于认为海外华人历史只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边缘学科，海外华人对于中国的发展影响甚微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影响。这想法是错误的。迈克尔·戈德莱的《来自南洋的中国官僚资本家》(剑桥，1981年)和我的早期著作《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已清楚地表明海外华人在晚清的近代史和辛亥革命中曾经起过的重要作用。

这一课题的重要性还在于了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因为海外华人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占用了中国外交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而且也影响了清朝对外国人的态度及整个中西关系。简言之，保护海外华人问题构成了晚清对其海外臣民的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便已成为西方对外扩张的目标和推销工业品的市场。中国人民成为鸦片和西方产品的消费者，倍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剥削。海外华人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他们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并深受歧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外华人是两个世界中无所适从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世界，却肩负着两个世界的压力。一方面，他们由于保持着旧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遭受外国人的歧

视；他们毫无例外地在文化上被视为不可取的人，在种族上被视为劣种人，他们首当其冲地受到外国人对中国的诋毁。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历了一些与旧儒家文化不同的新事物，受到一些外国影响，因而又被祖国政府视为潜在的危险分子。

当然，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政策并不仅仅是由于文化偏见的影响；它还受到了历史以及在鸦片战争期间对一些海外华人印象不佳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前，相对地说海外华人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清政府把他们看作“逃民”或“叛逆”而漠然视之。19世纪40年代条约口岸的开放，加速了华人外移的进程，并为沿海各省的中国人提供了出海谋财的新机会。加利福尼亚以及后来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的经济新发展，激发了许多贫困农民的希望和幻想。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看到了在海外谋生的机会和个人发财致富的途径。这些人甘愿冒朝廷惩罚的危险而移居国外。

条约口岸的开放也使中国的千百万贫苦农民受到外国人的剥削。由于在19世纪30年代奴隶贸易废止后，新世界劳动力短缺，中国就成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另一个来源。各条约口岸与澳门和香港一起，成为劳工承包商及其走狗进行活动的温床。成千上万在西方通常称之为“苦力”的贫苦农民，被诱拐或贩卖到新世界去。

海外华人数量的增长，无论是通过契约劳工还是自由移民，都给清政府带来了一些问题。许多人在异乡受到虐待或被杀死，到19世纪70年代，他们的遭遇已成为国际丑闻。清政府对华工本来并无什么感情，然而，这些丑闻不仅损害了它的尊严，也有损于它的国际地位。这个新的现实迫使清政府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以保护海外华人。

本书涉及的多半是清政府对待其海外臣民的方式，而这些

却又是清政府政策和态度的最好的指示器。本书所研究的是以概论1850年以前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政策开始。第一章探讨了宋、元、明三朝及清朝前期对海外华人的禁令与不保护政策的形成，认为清朝的不保护政策是从过去的政策，尤其是从明朝的政策演变而成的。

第二章和第三章阐述19世纪后半期清政府态度的转变过程。成千上万的华工外流，在出国航行途中华工所遭受的折磨及其在外国的苦难生活，迫使清政府比较认真地去考虑有关保护其海外臣民的问题。无论政府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华工所受耻辱使中国的总的形象受到损毁。在处理华工问题的过程中，政府被迫重新检查它对移民和海外华人的态度。这使得它对一些传统政策所依据的一些基本设想产生了疑问，从而改变了它对海外华人的敌视态度。

在清政府对移民和海外华人转变其敌视态度之时，中国在外交上不再保持沉默，于19世纪70年代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之中。派遣外交代表有利于采取新的态度，对1893年最终改变旧政策也有重大影响。中国在外国首都派驻外交官后，在有海外华人侨居的许多国家中建立了领事馆。于是清政府与它的海外臣民第一次有了正式接触。中国领事馆可以为政府收集有关海外华人的可靠情报，包括他们的财富、愿望和企求。同时，领事还可为保护海外华人有所作为。有关海外华人社会中外交流活动发展的详情，在第四章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自1873年至1893年的这些年间，是旧政策转变为新政策的过渡时期。一方面，保护海外华人的新任务，使中国外交官员对于海外华人在外国土地上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要起而抗争；但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又对支持这些斗争缺乏持久的热情和努力。对美国华人的保护，就是说明这一时期保护海外华人

问题的最好例子。本书第五章研究了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

在19世纪80年代，改变旧政策的条件虽已成熟，但直到1893年薛福成上奏朝廷后，旧的移民禁令才被正式废除。中国驻伦敦公使薛福成与驻海峡殖民地总领事黄遵宪，同属改良派外交官这个集团，他们提倡遵循西方路线改革制度和进行近代化，他们也认识到了海外华人的财富及专长对中国的经济近代化是有用的，他们的共同努力正式改变了关于移民和海外华人的政策。第六章研究了薛、黄两人在改变这一政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章还探讨了1893年以后中国这一新政策的推行，并论证了新政策的执行，总的说来并不如意。中国各省官员对新政策阳奉阴违，他们对归国侨民的偏见实质上从未改变过。更糟糕的是，这些官员与地方恶霸沆瀣一气，仍把归侨视为敲诈勒索的对象，试图从这些受害者身上榨取钱财。这就阻碍了大批海外侨商的归来或在国内投资。因此，这一章指出，中国官员根深蒂固的腐败陋习，以及对海外华人的冥顽不灵的偏见，是中国实施新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

新政策也成为保护海外华人的一个严峻考验。第七章说明，总理衙门和后来的外务部在协调推行积极的保侨政策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态度，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许多中国外交官对这一任务十分重视，尤其是对特别需要保护的美国华人。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但有好几位外交官，如伍廷芳和梁诚等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当然，新的保护政策在国外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清政府的软弱，也应归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各项政策。